

# 導言 民主與獨裁

關於民主與獨裁，說的和寫的，在今天都已經不少了。我們屢次聽說，民主是要保衛的；又常有人引證蘇聯，作為我們所須提防的獨裁制的一個例子。可是一方面有人把蘇聯描寫為獨裁制，同時却有在政治上見解不同的著名人物發表意見，認為在今日的蘇聯，在那裏存在着一種政府制度，實具有民主制的一切主要的特色。

民主制的最盛行的定義，大概要算林肯所說的，他把民主制描寫為『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講到蘇聯，對公務管理素有研究的著名學者韋白夫婦（註）曾經說過：『蘇聯並不是建立於政黨與人民的對立，好像其他一切國家一樣；蘇聯是由國內一切成年人民所參加的政府。他們是組織在各種集體裏面，各有其顯明的機能，根據一種新的「政治經濟」，進行該國的幾佔全部財富的生產。』（見 *Sovjet Communism*, p. 450）

假若這個描述是正確的，那末蘇聯便與通常所公認的民主制的定義，是融合了。但是韋白夫婦是著名的社會主義者，因此他們的描述與結論也許是有成見的。讓我再舉另一作者說的話，這位作者對於社會主義從來沒有任何同情，但是他却知道沙皇時代的俄國，最近也證實了韋白夫婦所得的印象，這位作者就是柏爾斯爵士。（Sir Bernard Pares）柏爾斯爵士曾在帝俄居住過。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建立蘇維埃政府之後，他在俄國

爲英政府工作，當時英政府曾用了將近一萬萬鎊鉅款於武裝的干涉，企圖撲滅俄國的革命。柏爾斯爵士於一九一九年回到英國，『在英國各地公開演講』，『反對在英實行布爾塞維克主義與政策的宣傳』（見*Moscow Admits a Critic* p.10）。

一直到了一九三五年的年底，柏爾斯博士才再到俄羅斯，那時俄羅斯已成爲蘇聯的最大的單位。在他這次回國之後，寫了一本關於遊俄印象的小書，在這本小書裏，他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到什麼程度，俄國的政府在它的人民看來是一個外人？』（譯者按：這句的意思是問蘇聯的人民與政府間有沒有什麼隔閡）

他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如下：

『在帝俄時代，我總時常覺得俄國政府幾乎是處於完全孤立的地位。當時的國務大臣，尤其是在帝俄末季的時候，大部分顯然是從很狹溢的、而且很庸碌的一羣中，胡亂地委用。我當然希望看見俄國的民衆能有機會參加到政府的範圍裏面去；到一九一七年，我暫時看到了這樣的情形。但是就是在那個時候，仍然有着比較不明顯的隔閱（雖則是很真確的隔閱），使俄國的知識階級與俄國的大衆分離開來。……我不得不說，在今日的莫斯科，這個鴻溝已完全消滅了，依我在俄國所觀察的公署與大規模的機關，政府與人民完全是打成一片了。』（見同書p.35）

釋者註：伊白夫婦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 是英國費邊派社會主義者的健將，與該派的簫伯納拉斯基等齊名，著作豐富，最近所著的 *Soviet Communism* 一書，風行一時。

這樣看來，韋白夫婦所謂「蘇聯是由全體成年的人民所參加的政府」，已被柏爾斯爵士的觀察所證實了。他們兩位都同意，蘇聯政府是爲民有的政府。可見他們兩位也都同意，蘇聯政府包含有若干特色，這些特色，我們認爲不是與獨裁制有聯繫，却是與民主制有聯繫。

我們有的時候往往把民主與獨裁看作兩個絕不相容的名詞，可是在事實上民主與獨裁也許常要代表同一政府制度的兩方面。試舉一個例子，倘若我們翻開大英百科全書看看『民主』一文，便可看見這樣說：『民主是政府的一種形式，在這裏面，人民可用下面兩種中任何一法來管理自己：或是由於直接自管，例如希臘小城市國家；或是通過他們的代表。』

但是這同一的作者接着這樣說：『並不是在這個城市國家裏面的全體人民都有參加政府的權利，有權利參加政府的只是那些被稱爲公民的（依當時法律的和原有的意義）。在這享受特權的幸福的一羣以外的，都是奴隸，這些奴隸對於他們做苦工中所要遵守的法律，並沒有關於立法的發言權。他們沒有政治的權利，也沒有任何民權，他們不能算是『人民』。這樣講來，希臘城市國家的民主，嚴格地說，也就不是民主了。』

希臘城市國家，常被歷史家稱爲民主的生產地。但是我們看了大英百科全書，便知道在事實上這民主只是爲着「享受特權的幸福的一羣」，而在當時真爲社會工作的奴隸，却是對於他們做苦工中所要遵守的法律，並沒有關於立法的發言權。

依上面的解釋，民主之古典的例子是只爲某部分人民的民主。在其他人民方面，在其他真爲社會做苦工的人民方面，這却是獨裁。即在民主的產生地本身，我們已可以看得到民主與獨裁同時並存，成爲同一政治制度的兩方面。如果我們只提起希臘城市國家的「民主」，而不指出這民主是爲誰而存在的，這是要使人迷惑的。如果我們描述希臘城市國家的民主，不指出這民主在當時能够存在，只是「沒有政治的權利也沒有任何民權的」奴隸做着苦工的結果，這也是僞造了民主根源的真正的歷史。

可見民主，依它的根源，就不會容許獨裁之同時的存在。我們所要提出的主要問題是：「爲着誰的民主？」——管轄誰的獨裁？

讓我們看看近代的世界。我們曾經說過，蘇聯常被人描寫爲獨裁。可是著名的權威描述蘇聯政府制度的力學家却把我們通常認爲民主的特色，歸之於蘇聯。在這個地方，是否也是民主爲着社會的二部分，獨裁是用來管着另一部分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可在一九一八年第一次蘇維埃憲法中找出來。根據這個憲法，蘇維埃國家的目的是要『建立城市和鄉村的工人與貧農聯合的獨裁，由此廢除人對人的剝削，並建立社會主義。』

城市和鄉村的工人，聯同貧農，佔我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五。所以這「民主」是最大多數人民——工作的人民——所治理的政府。這樣一來，蘇維埃國家恰恰是希臘城市國家的反面；在希臘城市國家裏面，工作的人民對於政府反而沒有發言權。

蘇維埃國家採用了工作公民的普選制度，沒有財產或居住的條件，也不因性別、民族、或宗教，而有所限制。凡是年在十八歲以上的公民，都有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但是那些為着利潤而使用勞動的人們，却被剝奪選舉的權利。這樣，蘇維埃國家為着工作人民而建立的民主，是他們今日在任何國家裏所享受不到的；但是對於僱主們，這個民主國却行使獨裁的權力。這一小羣勞工的僱主們，對於他們所要遵守的法律，是沒有關於立法的任何發言權。

這蘇維埃國家，從它的根源，就有意識地包含有民主的特色和獨裁的特色。但是這民主却是最大多數的人民所享受，而這獨裁却是加於最少數的人。在這裏，我不想詳細論及此事的緣由或是非，我只是要使這一點絕對明瞭：民主與獨裁並不一定就是絕對不相容的名詞。如果只是說起「民主」而不說明這是為着誰的，這是要使人迷惑的。如果只提起獨裁而不說明誰對誰獨裁，這也是要引起誤會的。

在一九一七年建立的這個蘇維埃國家，它自己承認是給與了最大多數人民以完全的民主權利。究竟它做到了沒有？在這本書的第一編，我將描述我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六年間親自經歷的蘇維埃生活的組織，就是要答覆這個問題。一個生長於工廠和土地、礦業和商店都屬私產的國家裏的人，從他看來，蘇維埃生活是一種新的生活，這種新的生活和其他國家裏的生活，是有着許多很大的差異。我親身經歷過這樣生活之後，我只能同意卓白夫婦和柏爾斯爵士對於蘇聯的意見，認為它在本質上是民主的。

但是倘若這種生活和其他國家裏的生活是有差異的，什麼使它有這樣的差異？這個蘇維埃國家是怎樣組織起來的，使由民主的英國來的遊歷者，也感覺到在這個蘇維埃國家裏，政府與人民是統一體，並感覺到它是真正的民主？在本書上第二編，我們將要看到這個蘇維埃國家是怎樣成立的，我們將要分析它的機構，我們將要看到它怎樣隨着國內社會關係的變化而發展起來的。在第一編裏所描述的新生活，就是在第二編裏所描述的新國家的主要的產物。

但是倘若這個蘇維埃國家給與了全民以民主，而這種民主竟使由民主的英國來的人得到深刻的印象，那末在我們自己的民主概念裏，也許有缺點吧。因為依今日在英國的我們看來，要說一方面有民主，同時又有反對任何階級的獨裁（無論這階級是怎樣小），這個觀念是無法調和的。這也許是由於我們對於民主的態度是有一些老式了吧！也許是由於我們對今日存在於英國的民主，估計得太高了吧！要解決這個問題。且看看這本書的第三編。

但是讓我們首先看看今日存在的蘇聯，看看他們所正在建立起來的新生活。其次讓我們仔細觀察這種新生活所在發展的骨架（譯者按：指蘇聯國家的機構），這個骨架本身也因着生活的要求而改變着。最後，在我們明瞭了蘇聯之後，讓我們回到自己的國家（按指英國），比較比較，再下最後的結論！

第一編 新的生活

## 第一章 機會平等

初到蘇聯工作的一個外國人，要被許多事情引起他的驚異。但是要對於日常生活覲得全豹，沒有職業比教師更適宜的了。在蘇聯工廠裏的一個外國工人，能得到在蘇聯工廠裏做一個工人所有的經驗。但是在蘇聯學校裏的一個工作者，不僅能得到這樣的重要經驗，並且還能與青年一代有經常的接觸，這些青年構成蘇聯人民中最年青最鮮新的羣衆。因為這個緣故，我覺得愉快的，是我在蘇聯所擔任的第一次的職務是在一個工業專門學校裏做教師，在那裏，我得到機會親自看到真正民主化的教育制度的進行狀況。

由曾在蘇聯以外教過書的每個人看來，必然使他感到驚異的是蘇聯教育的兩個特色。第一個是：學生是由各種有職業的人中招來的；他們只要是有求學必要的能力，越都有求學的機會，不致因為在求學的期間不能賺錢自給而受到經濟的牽累。第二個特色是蘇聯的學生，無論是在學校裏，或在工業專門學校裏，或在大學裏，都受訓練來參加公共事務的管理，先由學校或大學本身開始，擴展到蘇聯生活的各方面。在本章裏，我們將敘述蘇聯教育的這兩個特色中的第一個。在下章裏，我們將敘述第二個。

在一九一七年取得政權不久以後，俄羅斯蘇維埃政府的第一個命令就是關於教育的，裏面曾有這幾句話：「每個真正民主的國家，在教育的部門，在既知與文盲最佔人民中多數的國家裏，它的第一個目的就是要對於這個黑暗狀況鬥爭……它必須實行普及

的，強迫的，免費的教育。」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所頒行的蘇聯新憲法裏，每個公民都享受教育權，這教育權的保證是由於下述的辦法：即「普及的強迫的免費的初等教育，免費的高等教育；為高等學校的最大多數的學生建立國家津貼的制度；在學校裏用本地語文教授；為工廠、國營農場、機械和拖曳機站、以及集體農場工人，實施免費的職業教育、工業教育、和農業教育。」

要明瞭這兩個關於蘇聯教育政策的命令的重要性，必須知道某些基本的事實。在俄國未革命以前，俄國的成年人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不能讀不能寫的。今日，成年的文盲已減到百分之十了。在革命前的幾年，入學的兒童約達八百萬，在這裏面，只有五十萬受得到中等教育。在一九三四年，入學兒童已增到二千五百萬——有大不列顛人口一半以上，比較革命前的數目增加了三倍以上。到一九三四年年底，入學兒童的數量預計，要達三千萬人。

蘇聯教育如此迅速擴充，不是沒有經過很大困難的。我還記得，在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四年間，各教育機關都非常缺乏房屋。在城鎮裏，離校年齡很快地提高到十七歲和十八歲。但是學校却不够用：因此學校的房屋不得不分給兩羣兒童輪班用：年齡較小的在上半天用，年齡較大的下半天用。至於高等教育機關，我曾經在政府的公寓裏，下午六點鐘以後，教大學功課，因為在白天更早的時候，沒有房屋可供利用。

但是這種困難只是暫時的。在一九三五年，莫斯科曾經建築七十所以上的新學校；在一九三六年又增建一百二十所。現在輪班的辦法已經取消了。在別的中心區域，也實行了相類的建築新校的計劃，也把輪班的辦法停止了。今天在蘇聯的城鎮裏，每個兒童

都自七歲起受教育到十七歲或十八歲；在入校以前進幼稚園的數量一天天增加起來；修畢中等學校課程而升入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關的數量，也一天天增加起來。

蘇聯的教育制度還不是已完全的。在現在，城鎮裏的每個兒童都須受七歲至十七歲的強迫教育。這是過去幾年的成功。在鄉村裏，離校年齡仍在十四歲左右，但是已有某些鄉村已經進步到超過了這個限度。在雅斯納亞·波利恩納(Yasnaya Polyana)，這是托爾斯泰有一個時期住過的地方，在這裏就有一個為紀念托爾斯泰而設的學校，實施讀到十七歲的中等教育。在烏克蘭的洽皮夫卡(Chapayevka)，在那裏的集體農場也撥有必須的經費，用來提高離校年齡到十七歲。在這兩地方，鄉村裏的全體兒童都得繼續學校教育到十七歲，有些兒童從附近鄉村來的，也在那裏受到中等教育。我所以提出這兩個鄉村做例子，因為我曾經親自參觀過。這種鄉村的中等學校正在繼續不斷地增加起來。

從一個蘇聯中學出來的任何學生，只要他已達到必須的標準，都可以升入大學裏去。做了一個大學的學生，當他或她在繼續求學的期間，得接受國家的津貼。蘇聯的學生是於酬報的，高等教育在一切人那有享受的機會，並不因此有何經濟的負擔。全體學生，完畢了蘇聯的中等教育，都可以根據他們的能力，得到升入高等教育機關的機會。

但是在蘇聯的全體兒童還未能都享受到強迫的中等教育。倘若他們在十四歲的時候完畢了鄉村學校的教育，他們隨後可以進城鎮的工藝學校，或在集體農場裏開始工作。此外，在各工廠裏，有許多工人，其中有許多都還在二十幾歲的年齡，他們在十四歲後

從來沒有再受過學校教育。在過去幾年裏面，離校年齡曾被很快地提高起來，有好些兒童曾在十四歲就離校的，都覺得倘若他們遲生兩年，便也有機會繼續就學到十七歲。他們是否已失去了他們的機會呢？

在世界上沒有其他國家能像蘇聯這樣，使那些爲着或種原因因而失却中等教育機會的人，可以得到許多補救的便利。我記得，在我離開莫斯科不久以前，我在報上看到，在某些鄉村裏面，離校年齡較前提高，那些在三四年前，曾在十四歲的時候離開了學校，現在却繼續他們的教育，要享受剛才實施的中等教育。這些學校居然允許他們重新入校，享受提高離校年齡的利益，雖則他們在幾年前已經離開了學校。在這些鄉村裏面，有好些在十四歲的時候已經離開學校的人，居然到十七歲又得回到學校再讀三四年。

而且還不止此。因爲在蘇聯的成人教育制度已很廣大地擴充起來，所以幾乎每一個已在工作的公民，都可以由於免費的夜課，取得升入大學的資格。至於那些年齡較大的工人，他們在十四歲的時候就離開了學校，隨後只是受了單純的工藝訓練，他們也可以先在工作的地方，由於免費的夜課，受到中等教育，後來成爲全部時間的大學生，在大學裏的期間，也同樣可以接受經常的政府津貼。

一九三二年我在莫斯科所教過的英文科的學生，其中有許多就是這樣入校的。由鄉村裏來的青年農民，由工廠裏來的青年工人，他們都在十四歲的時候離開了學校，隨後在夜課裏繼續他們的學業，這樣使自己得到升入工業學校和大學的資格，最後成爲全部

## 時間的學生，把自己訓練成教師。

我說『幾於』每個已在工作的公民，在蘇聯都可能受到高等教育。在這裏所以用『幾於』這兩個字，因為在某種例外的事例裏面，也還有特殊的困難，使某些個人得不到所願有的訓練。關於這一點，我記起一個特殊的例子。我所要說的是一個在西比利亞鐵路火車上餐車裏的青年侍者。他對於戲劇有特殊的興趣，有志成為一個演員。但是因為他的工作是在餐車裏，每次要隨車旅行十天，然後休息幾天，這樣一來，他不可能讀經常的夜課。他在十四歲的時候就離開學校，因此倘若不是經過夜課的補習，不能得到資格去進戲劇專門學校或大學。依蘇聯一般的慣例，每個工作的人都可能進大學的，可是這個青年侍者在實際上只得把自己看作是這一般慣例中的不幸的例外。

以上我們所討論的是純屬教育範圍內的機會平等，但是在蘇聯機會的平等却遠超於教育的領域。

蘇聯生活之另一個最有趣的特色，從一個外國的遊歷家看來，也許要算各種業餘的活動和專業的活動，彼此之間的密切聯繫。這件事從學校裏開始，在學校裏的方式是兒童的功課和他們課餘的娛樂有着密切的聯繫。蘇聯的學校兒童，在他或她課餘的時間，有機會在學校裏面或其他專為兒童課外娛樂而設的機關裏，把自己做成一個青年博物學家，或攝影家、科學家、工程師、或發明家。在這些地方，都有相當的設備，免費應用，還請有講師指導。有許多蘇聯的兒童，今日到大學裏所選習的專門學科，就是他

們在以前學校裏所最感興趣的課外的娛樂。

在蘇聯的工廠和農場裏，人民的許多閒暇的時間——這種閒暇時間是很多的，因為在全蘇聯的工廠裏，每日工作的平均時間都在七小時以下——都用在業餘自娛的活動，例如演劇、文學、遊戲運動、攝影、藝術等等。但是這些業餘自娛的活動，不像在別的國家裏面所常見的一樣，是聽任各地熱心者自己去弄，並沒有專業者的幫助。因為在蘇聯的一切業餘自娛的活動，都有在那一特殊部門的專業者作有組織的幫助，由此使業餘自娛者的一般水準能够很迅速地提高，很迅速地達到專業的標準。

關於這件事的一個代表性的例子是戲劇的工作。在蘇聯每一個工廠裏都有工人的戲劇研究組。由職工會和專業的戲院訂立合同，請經過訓練的演員和導演家對於這些戲劇研究組作自願的或有報酬的輔導。這樣的結果是業餘的研究組到享專業者輔導的利益，能够提高它的標準，遠超於在英國所謂『業餘自娛』的程度，在英國所謂『業餘自娛』是含有不及『專業』的意義。

在蘇聯這種『業餘自娛』的戲劇研究組，只要達到了某種標準，可以在任何時候，由政府當局允許他們接收一個專業的戲院，成為他們全部時間的職業。我曾在莫斯科看到若干鄉村戲班的競賽，看見一個青年戲劇研究組的表演，其成績實可達到英國最好的有着固定戲班的戲院所能有的標準。這個全班的演員包括有青年男工人和女工人。他們以前都是高爾基（地名）的汽車廠裏戲劇俱樂部的會員。他們都曾經受過莫斯科的伐唐

閻夫戲院(Vachtangov Theatre)的專業的輔導，後來到了某階段，教育人民委員長(即教育部長)就給與他們幫助，成為全部時間的戲班，他們現在在一個俄羅斯鄉村裏有著他們自己的戲院了。這樣，在工廠裏的工人，可由於他們業餘自娛的戲劇研究，成為專業的男演員和女演員。

和戲劇的領域一樣，尋常的業餘自娛者也有機會成為一個專業者，就是關於油畫和寫作，關於遊戲運動和科學，也有同樣的機會。

在這裏說起遊戲運動，也許要引起某些讀者的疑問。這裏的意思，是不是說在蘇聯的遊戲運動有專業的性質？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今日在蘇聯，便利於遊戲運動的設備，在全國各處都很快地擴充起來。許多新的運動場都在開闢起來；工廠、集體農場、城鎮和鄉村，都有它們的運動隊，彼此在各種競賽和同盟競賽裏互相比賽。但是這些運動隊都須有訓練員。這些訓練員在蘇聯便是『專業者』。

任何蘇聯的工人都可以免費參加遊戲運動。那些運動的技術已有相當的程度，足夠在他們的城鎮或工廠的運動隊裏顯身手的，當他們要離開家鄉為運動隊出外比賽的時候，他們的盤川費用是由公家供給的；當他們為着比賽或受訓練而離開工作時，各該地的運動俱樂部是要付給工作時相等的工資。那些在任何運動中有出類拔萃的特長的，便有資格擔任訓練其他運動隊的全部時間工作的教練員。這樣，便替業餘運動員開闢一條途徑，使他們有機會成為全部時間的專業的教練員。

我們在上面已討論過在蘇聯機會平等的兩個方面：一個是對於全體公民的教育機會平等；還有一個是由業餘活動到專業活動有發展的可能，這却是在尋常的教育制度之外的。除此以外，還有其他關於機會平等的幾個方面，值得我們研究的。

在蘇聯並不是工廠裏或集體農場裏每個工人都要到大學裏去，或都要把某種業餘的活動變成全部時間的專業。在那裏有千百萬的工人對於他們目前所做的特殊工作有很大的興趣，但是他們却希望能進步到這一工作裏面更熟練或更大責任的部分。

每一個蘇聯機關都有一個特色，那就是它們都注重要使每一個工作的男子或女子在原來工作上提高資格。無論是一個初等學校或大學裡的教員，或是在一個工廠裏的工人，或是在一個辦公室裏的打字員，他們都可由免費的夜課，得到增進教育的機會。關於這方面，最好的工工尤盡更大的貢獻，他們常常自願地訓練其他工人，使他們達到自己所有的水準。

在一九三五年，有個世界聞名的鑄工斯塔哈諾夫，大家都知道這個青年在六小時每輪一班的工作上加倍生產，結果享受到大量突增的工資。當時在蘇聯以外有許多人都要這樣問道：『這件事的意義，是不是說有個新的特權的工人範疇將要起來，他們將專利工資特高的職務？』凡是當時住在蘇聯的人，都要覺得這個問題是和那裏的真正的生活狀況不合，因為這同一礦工斯塔哈諾夫，在他公餘的時間，就來往於他自己的和其他的礦裏，訓練那些的工人怎樣應用他的方法，由此在他們的工作上成為更有效率的組織者。

，由此增加他們的工資。這樣，在蘇聯處於領導地位的工人，是要訓練其他工人達至他們自己的水準。

依尋常工人的觀點看去，這是：在每一個工作領域裏面，最熟練的人都是自願的輔助者和訓練員。每一個工作的男子和女子，都可以由於最好的工人的輔導，在原來工作上就得到學習更高技術的機會。顯明地，這種制度在他本身就靠着某種經濟的條件。倘若像今日英國的情形一樣，在蘇聯處於領導地位的工人都覺得，在其他工人訓練好之後，也許就要替代他們的位置，那末他們也就不會願意去訓練其他工人，使其他工人達到他們自己的效率水準。在一個社會裏，一切熟練工人都肯充分合作來訓練其他工人，使其他工人也達到他們自己所有的技能水準，這種情形的獲得，必須在沒有失業、各種熟練工作都被需要的一種社會裏面。在蘇聯，自從一九三一年起就沒有失業，並且需要各種有能力的工人。在這種情形之下，熟練工人知道，訓練其他工人，並不致危及他自己們的安全，而且就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員的全社會說，由於有更多熟練工人的供給，和他們勞力的生產，大家都得到利益的。

此外在蘇聯還有一種機會平等還未曾討論到，這就是參加公務機關的工作。

依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的蘇維埃憲法，最大多數人民所得的選舉權，其規模之廣大，爲在俄國任何以前時候所不及。但是如果認爲在蘇聯的情況之下，要參加公務機關的工作，全靠人民的選舉權，那却是一個很大的錯誤。我們必須明白，在蘇聯今日，並不像

在其他國家裏那樣，在所謂『文官職務』和其他職業之間還有着什麼鴻溝。這種情形的理由是這樣：因為一切工業和商業都握在國家的手裏，一個工廠裏的經理和一個工廠裏的工人彼此間的關係，在本質上並無異於一個國立醫院的院長和在那裏工作的醫師彼此間的關係，並無異於一個國立學校的校長和該校一位教員彼此間的關係。在蘇聯的全體公民，就某一個意義說來，都可算是官吏。由這樣的情形推斷起來，在任何特殊的職業上，升到最熟練和最負責的位置，這意義在實際上就等於有升到公務機關裏最高位置的可能。

關於蘇聯的公務管理，還有一個特點在這裏也要提及的。我們在前面雖研究過業餘的演員，我們却未曾說到『業餘的』管理者，即在種種市政機關和政府機關裏有若干自願的工作者，這種工作者也是蘇聯國家政府機構的一個主要部分。選出代表參加蘇維埃或會議，參加國政的治理，這在蘇聯的選舉原是一件司空見慣的事情；不但如此，除此之外，還有一件被視為尋常的事情，選舉人還要推出更多代表，以便他們在業餘自願地參加蘇維埃的各部的工作。這樣，自願的公務工作者對於蘇維埃區的健康、住宅、教育以及其他公務，也盡着相當大的力量，關於保衛團的工作，也有同樣的情形。

在這個範圍，如在工廠裏業於的活動一樣，這種自願的工作，也是錄用能幹的正式管理者的來源。工廠裏的工人，無論是男的或女的，如果在他們業餘的時間能替蘇維埃的許多部的一部，做很好的工作，可能在任何时候被請去正式做這工作，使這工作成爲